



真理报

第二期

4月22日2025年

走马恩列斯毛指引的光辉道路！

纪念伟大导师列宁同志 诞辰155周年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换新天以及东风小组

毛

主

席

语

录

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编者的话

同志们，

鉴于本月事务混乱（主编和副主编被开盒炒作），我们原定四月出版的报纸，定于五月初出版，多有不便，请诸位谅解。

人民战争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人民万岁！

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时事评述

- ★ 我们支持比亚迪工人们的罢工斗争！ 1
- ★ 时评：说用典（换新天） 2-3
- ★ 打碎特权的镜子：从协和医院事件看当代中国修正主义体制的阶级本质 4-5
- ★ 中美贸易战的阶级本质与帝国主义矛盾 6-7
- ★ 医疗商品化的悲剧与制度性暴力的回响 8-9
- ★ 时评：社会的艾滋病（换新天） 9-12
- ★ 小米碰撞事件，资本的虚假营销 13-14

百家争鸣

- ★ 论马克思主义其二-科学社会主义 15-16
- ★ 论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17-21

不周山下

- ★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为与印度中央政府
和邦政府的和平谈判制定条件 22
- ★ 《人民报》：国际团体向新人民军致贺信庆祝其成立56周年 23
- ★ 土耳其：“让我们重新点燃燃烧的草原，加强并发展反法西斯斗争！” 24-26

历史文献

- ★ 论波兰问题 27

导师语录

28



我们支持比亚迪工人人们的罢工斗争！

我们声援比亚迪工人的罢工斗争！

最早发起罢工抗议活动的，是比亚迪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一座工厂，上千名工厂工人于3月28日与29日聚集在工厂区域内，对比亚迪违背先前承诺调降员工收入一事表达不满。除了比亚迪的无锡工厂外，比亚迪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工厂也于3月31日爆发大规模维权抗议事件。

有抗议员工接受访问时指出，捷普集团预留的补偿金额约有10亿元人民币，足以向所有不满的员工提供合理补偿。该名员工也愤怒的表示，比亚迪成都工厂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内，频繁透过调整岗位、轮休、安排员工外派支援以及苛扣员工绩效公司的方式，不断降低员工的待遇与薪资收入，进而引发许多员工不满。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赤裸裸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斗争。马克思的论述再清晰不过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

“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关于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内部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生产富裕，另一方面生产贫穷。这一过程便会生产出来一整个过剩人口，变成资本的后备军，可以任意被资本支配。工人做的越多，越是贫穷，这一观点，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就有体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异化，这种异化已经变成了无法忍受的力量，大多数的群众已经一无所有，已经无法生活。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人的生活是有些许底线的，也就是说，不是随意的。虽然阶级制约着人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又反过来被这些东西规定。当然，在这里，这些东西不应当被赘述。马克思同志已经论述过很多遍了。

为了对抗资产阶级，工人不得不组织成一个阶级，起初，这种斗争，是经济的，采取的是工会的形式，是从加工资开始的，但是随着经济斗争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光解决工资，这种分配社会总产品的形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在于这种生产方式-即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生产。不去解决生产方式的问题，剩下的一切都会告吹。而一切的生产方式都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之上。组织成阶级，不仅仅需要工人们组织成工会，而且要组织成政党（当然，这里需要外部 人的帮助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述“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要人帮忙来区分开的”，工人自己只能组成类似The Labour Party（英国工党）的政党）。

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好，敢于反抗是第一枪！这一点勇气是很重要的，没有革命的勇气，我们便不会有革命这件事实，但是革命也不是空有精神的，革命本质上还是物质力量的冲突。我们不会贬低经济斗争的意义，但是我们绝对不把经济斗争当成终点！

与资本角力的比亚迪工人万岁！薪资的上涨与完备的五险一金万岁！革命的无产阶级万岁！



时评：说用典（换新天）

4月15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马来语版）启播仪式在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第一副总理扎希德发来贺信，祝贺节目在马来西亚播出。马政治、经济、文化、媒体、学术等各界知名人士2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节目即日起在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马来语版）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传承创新、保护生物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天下为公的深厚情怀以及博古通今的历史文化底蕴。

中国是一个有着三千年成文历史的古国，中国人是极其爱用典故的，我们亲爱的习主席也不能免俗。当然，有时他讲话用典，搞出一些口误，最后怡笑大方。无论是“金科律玉”“颐使气指”“精湛细腻”“通商宽衣”还是“萨格尔王”“撒胡椒面”，每一次小笑话都能被自由派追着晒笑。我们对这样的低级趣味是不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总书记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典。

为此，人民日报社倾力推出《习近平用典》一书，堪称新时代的“语录体续编”。此书由社长杨振武亲自主持编写，副总编辑卢新宁组织团队深挖总书记每一则用典背后的深意，全书26万字，135条典故，涵盖“敬民、修身、法治”等十三章节，可谓是“用典如用兵，用语如用权”的典范。每条典故都有现代意义解读，俨然一部“当代圣训”。《习近平用典》告诉我们：言必师古，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展现文化自信；语涉三皇五帝，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自带“天命加持”。满口的“之乎者也”、字字仁义道德，不仅可以显示“儒雅气质”，还能顺便撑起“文化大国”的牌坊。至于用错了几个词、口滑了几回舌，反倒成了他“真性情”的表现，一不小心还成了“亲民”形象的另类素材包。说到底，谁说一个领导人不可以偶尔来点“语言的风趣”？何况，这些口误如今也早已升华成了新时代的“典中典”——别人用典是学识渊博，习主席用典是“领袖智慧”。这可不是简单的错字漏嘴，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国话语艺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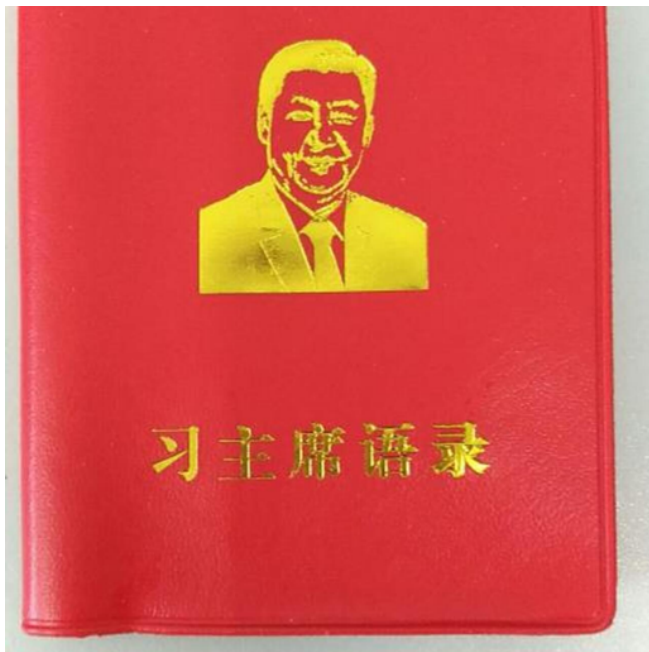
我们不愿再提他所谓的“孔老二的艺术”，那副把论语当成《新时代领导力教程》的模样，实在让人看得倒胃。如今，他口中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早就成了“古为己用、推陈出糟”。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他拿来当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注脚，仿佛只要嘴里嚼两句古文，背后就站着儒家三千弟子给他鼓掌。问题是，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位中修路线的当代代言人，他的嘴里早已吐不出一丁点新鲜玩意儿。除了那些挂在嘴边的“典出《尚书》”“语出《论语》”，他那被捧上神坛的“理论创新”，不过是把老祖宗的灰包上一层“中国特色”的金粉，糊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假马列像片。你听他讲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结果却是烹民如炖汤；你看他说“为政以德”，背地里却忙着把整风搞成清洗，把领导说成“核心”。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说到底，不过是他把“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了层“古圣先贤”的糖纸。什么“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问题”，在他嘴里听上去好像要解答一道哲学高考题，实则不过是在找个漂亮说辞，把修正主义那套东西继续穿上红色外衣罢了。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飞跃”，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不过是从阶级斗争的桥头跳进了调和阶级矛盾的泥潭里，一边喊着“人民至上”，一边跟大资本“亲密握手”；一边高喊“共同富裕”，一边让房地产吸干百姓最后一滴血。而他之所以老是翻腾出些“陈谷子烂芝麻”，不正是因为他再也拿不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符合时代逻辑的实践方案了吗？所以，他得不断地往《诗经》《尚书》里挖金句，用“古为今用”的名义缝缝补补，为自己在修正主义的小路上披荆斩棘涂脂抹粉，仿佛只要典故足够多、字够古，走错的路也能显得“走得厚重”。在这里，古代圣贤成了新时代“话术供应链”，而“孔老二”也终于实现了与邓老二、习老大跨越时空的“统一战线”。中修只有不断地重提这些故纸堆里的陈谷子烂芝麻，才能时刻保有着所谓的中国特色，才能为他在修正主义的小路上披荆斩棘找到借口。



这样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是一种把理论创新彻底变成装潢术的自信；这样的“话语体系”，说到底，是一场把新瓶装旧酒、再贴个标签就卖给人民群众的骗局。而这位“新飞跃”的飞行员，嘴上念的是春秋大义，脚下踩的却是工人农民的脊梁——只可惜，他的“飞跃”，注定飞不出修正主义的那口古井。

中国的典看起来大抵是用不了了，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话写文章最爱用红色的典，没了马恩列斯毛，他们是讲不出话的，当然，这些人也有最能耐的一点，他们总是能用革命导师的话来为自己说话，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贴金，仿佛语录是他的甲，只要叠的漂漂亮亮，那就无可指摘，正确地要命。正如大和尚念经一样，导师的话成了新的之乎者也，革命的语言瞬间失去了激情的红色，新的卫道士诞生了。

真正的革命者从不反对用典，毛主席本人就很爱用典故，当然他自己的语言也形成了不少典故，什么“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用典一定是人听得懂，恰当、到位，而不是为了水个字数，拿来撑腰。革命不是颂经拜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我们不能做畏畏缩缩的和尚，做革命群众的尾巴。革命者要做先锋队员，要善于利用他学的典武装头脑、指导革命。



打碎特权的镜子：从协和医院事件看当代中国修正主义体制的阶级本质

“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两个敌对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对立贯穿于国家机器的每一个毛孔。”——列宁

一、事件概述：特权与腐败的冰山一角

2025年4月以来，北京协和医院（含中日友好医院）发生的一起医疗伦理丑闻引发舆论热潮。胸外科医生肖飞与规培生董袭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且在手术中因个人情感离开手术台，致使病患在麻醉状态下被弃于无医护照看40分钟，严重违反医疗规定，危及生命安全。同时，董袭莹“经济学本科转医学博士”的神速履历及其进入“协和4+4”医学培养体系的路径引发社会对精英教育、裙带操作与医教特权化的广泛质疑。在修正主义舆论控制下，此类事件常被简化为“个人道德失范”或“制度漏洞”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出发，我们必须揭示隐藏其后的深层阶级结构与意识形态逻辑。

二、“协和4+4”：特权阶级重塑上升通道的制度设计
所谓“协和4+4”，即由清华大学与协和医院合作开设的本硕博连读项目，以“跨学科+精英医学”为卖点。但从其录取制度与培养目标来看，它并非为普及基层医疗而生，而是为高端医疗市场培养行政医学官僚、科研精英和资本化医生。普通工农子弟极难通过此类项目实现阶层跃升，而其开放度、透明度、录取标准长期不公开，使其极易成为特权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医疗体系的“绿色通道”。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在形式上是公仆，但它的本质是统治的工具。”当医疗教育系统不再为群众健康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及其子弟开辟特权路径，它就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资本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干部都要这样想问题。”今天的“协和4+4”却完全背离了这个方向，它服务的不是人民大众，而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中国的权贵子弟就是靠这种方式，给自己的无能与无知披上了一层遮羞布。在这一过程中，再生产得以完成（这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一生爱走后门的董四医生
#中日友好医院肖飞 #规培日常 #规培有没有一种可能，某人的求学职业生涯没有一件事是合规的？

三、医疗商品化的恶果：从“以病人为中心”到“拿病人开玩笑”

这是一个必然，在今天的中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每一个部门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变成了交换价值，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医疗也是一样。医疗行业本应具备高度职业伦理，但协和事件中医生对病患生命安全的冷漠、对规培生的剥削、对岗位职责的戏谑，反映出在私有化与市场化主导下，医疗领域已逐渐丧失其人民性。毛主席曾指出：“医生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金钱的走狗。”但在今天，医患关系已经异化为客户与服务商关系，医生成为资本和技术的附庸，医院变成牟利工具，而规培生则沦为低成本的“打工仔”。我们可以回顾文革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那时，医疗面向农村群众，强调“预防为主”，医生深入田间地头，“三结合”办医（群众、赤脚医生、医生相结合）。而今天，资本主导的医疗体系以昂贵的医疗资源、等级化的诊疗体系和医药产业利润为核心，远离了人民大众。

四、从“医”到“教”：特权的双重嵌套与系统性再生产
协和事件不仅暴露出医疗系统的问题，更暴露了教育系统已成为特权再生产的工具。董袭莹本科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凭借“神秘力量”进入协和博士项目，再以规培身份获得核心医疗岗位。背后体现的不是她个人的学术能力，更是资本对教育路径的操控。在毛主席时代，国家通过工农兵学员制度、大量培养赤脚医生与农村基层医务人员，打破了旧文凭阶层和特权壁垒。而今天，“名校—规培—博士—编制”成为资产阶级家庭的专属路径，教育资源的分配早已脱离“按需分配”，沦为“按阶级背景分配”。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强调：“教育制度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今天的教育早已不再服务社会主义，而是为资本积累与资产阶级再生产开道。

五、为何修正主义制度不能防止这种腐败？

许多人疑问：为何如此严重的问题层出不穷，却无人问责、制度失效？因为这是修正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自1978年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具有“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逐渐确立，虽然在政治上依然披着“社会主义”外衣，但实际上国家机器已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党的组织路线、干部选拔制度、医疗教育政策都逐步服务于资本积累和精英统治，而非为了人民群众。毛主席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警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今天的党政干部系统中，多少人通过子女输送、岗位倾斜、项目推荐等方式复制特权？协和事件暴露的正是这种修正主义统治阶层的本质。而且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提及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只生产资本本身，还有这个生产关系。因为资本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力的问题，资本还是一个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指出的那样。

六、补充分析：协和制度结构与“协和4+4”的运作逻辑
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医学院合作后形成的“协和4+4”体系，其招生政策早已被批评为不透明、带有政治倾斜。这点是正常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不会有脱离政治的东西。其“预科+博士”模式实际上剥夺了本硕博之间的择优选拔机制，直接以推荐名额包裹了整个教育链条，使得特权阶层的子女得以轻松进入。更值得注意的是，协和医学院近年来通过设立“综合评估”“背景审核”等非公开程序，使得资源更倾向于“有门路、有关系”的家庭。这种制度安排直接制造了“新贵阶层”的医教霸权，其实质已沦为修正主义体制下的“文凭寡头”。

结尾：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但愤怒不能够替代革命。要改变这一切，必须从群众出发，唤起广大群众对特权阶层的认识与憎恨，引导他们通过组织斗争，争取真正的政治与制度变革。我们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继续革命理论、坚持群众监督，打破医疗和教育的垄断与私有化，彻底铲除特权阶层赖以生存的根基。正如毛主席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做到这一点，光有个体的行动是不足的，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军事化的共产党。我们必须将这把火引向更广泛的阶级斗争战场，把舆论引向组织，把斗争引向革命。



中美贸易战的阶级本质与帝国主义矛盾

引言：

今天我们讲一个你们每天都能在新闻里听到，但是主流舆论从来不告诉你真实本质的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战。有人说它是“两个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争吵”，有人说“我们要团结一致对抗美国制裁”，还有人说“这会让世界回到冷战时代”。但我们需要看到这起事件的本质，那就是：是谁与谁打仗？谁得利？谁受害？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工人阶级应当怎么看？我们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而是要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上透过现象看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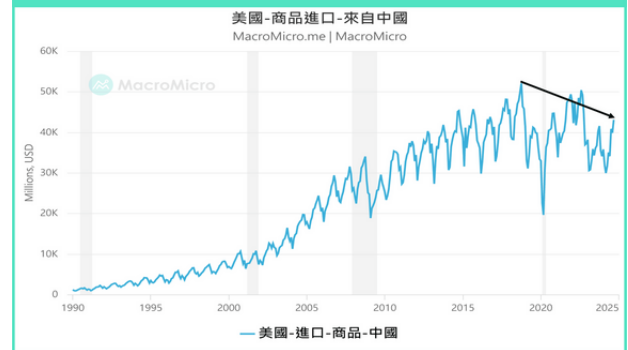
一：表面现象VS本质矛盾

我们先来还原这个事件。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涉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农产品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则以“反制”名义，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场冲突逐渐扩大，蔓延到科技战（如华为、中芯）、金融战（限制中企在美上市）、信息战（限制TikTok）。表面看上去，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争经济利益。但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共产党宣言》。国家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利益在主导。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切入，也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看看是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发动了战争，它代表了什么制度，它要打压谁，它要掠夺谁。



貿易戰影響：中國對美出口停滯，單月貿易量衰退近兩成



二：列宁告诉我们什么是帝国主义

在解释贸易战之前，我们必须回到列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总结出五大特征：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垄断组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寡头；资本输出成为主要特征；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已被列强重新划分多次，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在这里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市场、投资空间而爆发冲突。”还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那么，中美贸易战就是这样的冲突吗？是的，我们看它是否符合特征：双方都有垄断资本（谷歌、苹果、华为、阿里、腾讯）；都有金融挂肉控制国家政策；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都要争夺国际市场，控制原材料，争技术主导权。所以，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帝国主义的之间的霸权冲突。

三：美帝国主义的危机与反扑

我们来分析美国

特征：老牌帝国主义霸权下降，在过去美帝国主义通过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军事力量控制并且掠夺世界，但现在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金融过度虚拟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分化严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对全球化失望，转而投向贸易保护主义。于是特朗普提出“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搞“产业回流”，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其实本质就是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企业集团恢复其全球主导地位的野心。

四：中帝国主义的崛起和扩张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今天的中国

有的人可能会说：“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不是帝国主义”。事实就是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当从社会的生产方式出发，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中国早在1978年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而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完全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国有企业与私人资本高度融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如中石油、华为、国开行）；对外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一带一路”建港口、铁路、矿山；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争夺资源和市场；打压工人、镇压抗争，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中国正挑战美国垄断；华为要在5G标准上压美国；中国芯片产业要替代英特尔和台积电；中企抢占非洲与拉美通讯、金融市场。所以，美国打贸易战，不是因为中国“穷”，而是因为中国崛起为新帝国主义竞争者，美国要把它压下去。这里也许会有先生争辩“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同志指出“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所以我们看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关系被推到巅峰的杰作。问题还是在于哪个阶级的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



五：贸易战打的是谁？牺牲的是谁？

有的媒体说：“中美都受伤了。”这话对吗？我们从阶级分析来看：

谁发动了贸易战？

答：是美国的华尔街金融资本；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的垄断资本）

谁是受害者？

答：中国的工人：企业订单减少，大规模裁员，工资压低；美国的工人：产品涨价、失业、生活成本上升；第三世界人民：中国和美国都转而对非洲、东南亚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所以贸易战根本不是“民族之间”的问题，而是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用工人鲜血争市场、争霸权的战争。

六：我们的立场和任务是什么？

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下立场：

不能站队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不能说“中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要爱国支持民族企业”这是民族主义的毒药。也不能幻想通过美国能“制裁中国资本解放中国人民”，那是托派和自由派的幻想。正如毛主席说：“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决不会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

我们要做什么？

揭露这场战争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之间的狗咬狗；动员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压榨；支持美国工人反对“美国优先”的排外政策；推动两国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要进行组织、宣传、教育和革命实践，最终推翻中美两个帝国主义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终结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

医疗商品化的悲剧与制度性暴力的回响

引言：

2025年4月28日，天津市天津医院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2名医生死亡、4人受伤。事件震惊全国。行凶者简某因误解医保政策，认为其手术费用应全部报销，因欠费问题与医护人员发生激烈冲突后，遂持刀行凶。这场看似突发的血案，其实并非孤例，而是资本主义医疗体制矛盾的集中爆发。从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这是医疗商品化、群众医疗权利被剥夺的社会根源暴露，是制度性暴力的又一次体现。

一：事件的基本事实与社会反应

据媒体公开资料显示，行凶者简某系河北籍无业人员，于4月11日因病入住天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出院后仍欠费一万余元，简某因不满医保报销政策，先后多次与医院发生争执，最终在4月28日晚持刀杀入医生办公室，造成6人伤亡，其中运动损伤关节镜二科副主任医师骆巍不幸遇害。事件发生后，财新网等少数媒体一度对此进行报道，但旋即被删除。天津医院对外否认发生暴力袭击，医院正常运营，而网络挂号系统却显示骆巍的门诊被取消。此种封锁信息、淡化事态的处理方式，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和疑问。

二：表面上是医患冲突，实则是阶级矛盾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一点那就是这不是简单的“精神病发作”或“个人极端行为”，而是阶级矛盾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指出：“经济结构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中国的医疗体制已彻底商品化，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医院作为企业运营，医生作为“创收机器”，病人则被异化为“客户”或“消费者”。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阶级压迫无处不在。简某虽为行凶者，但他所代表的是一大批因病致贫、因病受辱、在医疗体系中长期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群众。他没有稳定收入，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与繁杂的医保报销程序，长期积怨爆发为极端暴力。正如列宁所说：“暴力是被压迫阶级在失去一切希望后的最后呼喊。”



三：医疗体制的商品化逻辑：从为人民服务到利润服务

毛主席指出“医药卫生工作者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全部生命奉献给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了人民公费医疗制度，农村有合作医疗，城市有免费保健，群众看病基本不花钱，医患之间是同志式的关系。医生是“赤脚医生”，不为利润服务，而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然而，改革开放后，医疗体制的市场化使得医院脱离了公益性质，走向自负盈亏。根据国家审计署2019年数据，中国公立医院中政府财政拨款所占比重从1980年代的60%以上下降到不足10%。为了生存，很多医院不得不通过开检查、用贵药、安排大手术来实现“创收”医生背上了“创收指标”，病人不再是人民，而是“利润来源”。这使得医疗体制不再是服务于人民的制度，而是压迫与盘剥人民的机制。在此制度下，医患系被异化为剥削关系，阶级矛盾加剧，社会戾气蔓延。而天津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一制度逻辑的爆发点。

四：暴力袭医的频发：制度性暴力反噬自身

天津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中国频繁发生医患冲突乃至持刀袭医事件：2016年，北京民航医院医生杨文被患者家属刺死；2012年，哈尔滨一医生遭病人砍伤；2023年，重庆某三甲医院医生遭无故殴打致伤……这些事件层出不穷，说明充分说明了这已非偶发性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制度性问题的集中反映。我们必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正常社会，为什么医生频频被砍？为什么患者屡屡走向极端？答案在于：制度性暴力。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当国家对群众医疗权利的剥夺变成了结构性制度时，这种压迫也必然以暴力形式反弹。在没有民主渠道、没有真正医疗保障的社会中，个人极端行为正是制度暴力的反噬。

五、媒体沉默与消息封锁：剥夺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迅速被删除，医院否认暴力事件，舆论被刻意压制。群众对医疗体制的愤怒被引导位“同情医生”与“谴责凶手”的二元对立叙事，这种叙事掩盖了根本的结构问题：为什么这个制度让病人成为了潜在的凶手？列宁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中国现行体制对媒体、网络的严密控制，已使群众失去了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这种舆论导向只会掩盖矛盾、积聚怒火，最终以更大规模的社会爆发形式出现。

六：出路：建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
我们要问：能不能有不杀医生、不激化矛盾的医疗制度？毛主席时代给出了答案。

在人民公社、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医患之间是革命同志；在计划经济保障下，医疗是免费的或极低成本的基本保障；医生下乡、巡诊、服务最基层人民，群众拥护、信任、依赖医生。要解决医患关系的对立、制度性暴力的根源，就必须：彻底废除医疗商品化制度，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医疗体系；重建国家公共医疗保障体系，恢复免费或低价医疗；扩大群众民主权利，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与医患共同管理机制；在城市中推行社区集体医疗站，在农村中恢复合作医疗体系；医学院重设招生标准与教学方向，以服务人民为核心目标而非收入前景。这些措施必须以彻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毛主席曾说过：“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医疗制度的革命同样如此，不能指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修补，而必须推翻现存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重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

七：从制度悲剧中汲取革命的教训

这个制度会不停地产生这样的悲剧，这一次结束了，还会有下一次。因为资本主义总会生产贫困，在财富的另一头进行生产。我们不得不去砸碎这个体制，占有所有的生产力。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更是为了生存！为了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军事化共产党是不行的。



时评：社会的艾滋病（换新天）

艾滋病是目前人类所知的疾病中最难治疗也无法治愈的传染疾病，众所周知，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性传播与母婴传播。学过逻辑学的同志一定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东西如果它看起来像鸭子、游泳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么它可能就是只鸭子。可是现在也有东西靠血液传播、性传播与母婴传播，那它一定就是一种艾滋病了。作为社会医生的我们今天就来会会诊，看看这个艾滋病。

2025年4月19日晚，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常旭强在哔哩哔哩发布了一段52分钟的实名视频，并附上逾百页的PPT，指控该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宫琳长期利用职权泄露保研复试试题、以“辅导学习”“陪同运动”为由对其进行猥亵骚扰，并在多地开房发生性关系，同时涉嫌将科研经费用于私人应酬，造成常旭强患上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北京理工大学于4月20日凌晨在官方微博发布首则情况通报，称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初步核查认定宫琳涉嫌师德失范行为基本属实，学校决定立即暂停其一切行政与教学职务，并承诺将及时公布后续核查结果和处置情况。



同日中午，学校再次发布通报，经研究决定给予宫琳开除中共党籍处分，免去其行政职务，撤销教授职称及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并解除聘用关系，同时已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撤销其教师资格。后续爆料称，常旭强在与老师的交往中，也曾多次向宫琳索要金钱、保研名额及其他物质利益，举报动机或与房产购买请求遭拒有关。此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质疑举报者并非“纯粹受害者”，也有人呼吁将关注点放在权力监督与师德建设上。



近日，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被妻子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名医护人员，举报信中还称肖飞和出轨对象丢下已麻醉的病人，两人一起离开手术室长达40分钟。网传消息称：“出轨对象中的董袭莹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回国后读“协和4+4模式”只用4年便拿了博士学位”而“协和4+4”模式引发网民热议。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去年曾发文称：“本科西班牙语也有机会考协和医学院做医生！”她称协和4+4班为任何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转学医学提供了可能，她还列出了一份表格，显示该项目从18年到23年6月，已录取148人，其中有本科专业为西班牙语、地质学、也有国外学经济学的学生在协和学习4年后直接拿博士学位，甚至他们的规培还可以从3年免去2年只需要1年。这份表格曝光后，不少网民质疑该模式的公平性，有博主表示：“我更关心的是那位跨行学医的董小姐有没有挤压普通医学生的资源”“用一年时间走完院内其他同事八年的路，足以证明其制度优越性”“人家规培三年，她规培一年，非医学专业转临床博士”医学博主“庄时利和”解读“协和4+4”模式，他称该模式是参照美国的医学生培养模式，希望能通过学制改革的方实纳入更多精英进入医学院，并且要求十分严格，需要本科有指定的国内学校(基本985)和国外高水平学校，需要有一些必修课程和学分要求。他认为董袭莹能上手术台其实没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主刀医生肖飞，在病人麻醉后擅自离开手术台。他表示“高学历只过滤学渣，不过滤人渣”



而随着时间的发酵，更多细节随之曝光：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中业集团合作在河北廊坊建设分院，项目获中央专项拨款77亿元用于高端医疗设备采购。据有关招标文件和审计报告显示，该分院基建由国企中冶建研院负责，设备采购则落入名为“中野即信”的项目公司。据称，中野即信与中冶建研院之间通过伪造股权关系，将原本属于公立医院的质子放疗设备转投至民办体系运营，中间款项多次转手，资金流向存在异常。董小姐家族在该项目审批和人才推荐环节均有身影。董某莹之母为北京科技大学金属材料领域副院长，其学术身份与项目所需高端钢材技术评审相关联；同时，协和“4+4”项目要求医学推荐信，董某莹获该项目绿色通道，使其得以进入长学制班并迅速完成博士学位及规培。卫健委内部审查资料显示，一位与董家关系密切的官员曾参与分院项目初审，但在外部举报后，以“程序瑕疵”“补齐短板”为由暂停进一步调查；数月后，该项目资产又被卫健委以回购方式纳入官方体系。目前，河北省及国家有关部门已对分院建设、资金使用和设备采购流程立案核查，相关责任人名单尚在整理中。“协和4+4”董小姐事件持续发酵，公众质疑焦点已从入学通道与资金流向，进一步延伸至其博士论文的专业错配问题。根据现有信息，董小姐的博士导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贵兴，是骨科领域的权威专家，而她所发表的博士论文却聚焦于“妇科肿瘤影像”研究方向，引发外界强烈质疑论文的专业指导与合规性。对此，有网友挖出关键线索指出，邱贵兴院士的夫人正是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大夫。两人曾以“贤伉俪”身份登上人民网公开报道。也就是说，董小姐虽挂名骨科院士为导师，其论文实则可能由“师娘”从妇产科方向给予实质性指点。该现象被质疑为“论文挂靠”与“学术资源家庭化”的又一典型案例。不仅如此，邱院士过往的公开言论也遭遇舆论重新审视。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他曾面向镜头感慨“赤脚医生”带来的医德与技术困扰，强调“还要培训他们，还要对他们负责”，语气颇多委屈。而在另一场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他则回忆自己年轻时“一边看书一边学做手术”的艰难岁月。仿佛离开了舒适的城市，扎根农村服务人民是一场不愿回首的“磨难”。



邱贵兴（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到农村以后，那些赤脚医生他们是老大，我们还要培训他，出了问题还要我们负责任，还不能说这个赤脚医生有问题。要说有问题说明你立场，阶级立场有问题。他们就提出口号要从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把这个刀把子拿过来，就是说这个刀把子不能叫你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拿。

解说：现在已经是学科领军人物的邱贵兴，可以说实现了自己1960年考入协和时的职业愿景。只是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浩劫，让他的从医之路走的曲折又艰难。

邱贵兴：大跃进后来慢慢结束了，1959年就开始国家要抓经济了，要恢复了。所以1959年成立中国医科大学，那么我是1960年入北大的。

解说：在1953年和1957年，两度停招医学生后，1959年协和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恢复八年制教育开始招生。

这两则报道，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实则关联颇深。所谓的“偷情”，在这些人看来，不过是达成目的、向上攀登的手段。可是在制度的深处，它早就不是“情爱问题”或“私德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权力、资源、利益的交换。有人为了科研项目，有人为了保研名额，有人为了博士学位，有人为了手术台上的地位……而所有这些目的，统统包裹在一层“制度化”外衣下，干净体面，逻辑自洽，甚至还能挂上“学术改革”“国际接轨”的牌子。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问题：谁来监督权力？谁来界定“公正”？当性别、身份、资源、评价体系都已经商品化，学术殿堂便沦为权力场，医疗救治也蜕变为资本操盘。

这，就是说的那个“艾滋病”。

它靠什么传播？不只是血液，不只是性，更不只是母婴——它还靠制度，靠特权，靠资产阶级的“人情世故”传播。它像病毒一样在各行各业复制自己，从校园到医院，从科研经费到医疗设备，哪里有“上行通道”，哪里就有“人肉跳板”；哪里有“制度豁口”，哪里就有“身份捷径”。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病灶——以公谋私、权钱交易、裙带横行。

可怕的是，这个“艾滋病”不痛不痒，不发烧不咳嗽，它不需要你走进深山老林或瘟疫之地，它就长在象牙塔、手术台和科研楼的走廊里。它最大的伪装，就是“合法”二字——程序合法、文件齐全、学分达标、关系安排得体。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一个“董小姐”，也不能只聚焦一个“宫琳”，真正要问的是：这类人为何能顺利穿越制度缝隙？他们身后的关系网、审批链、推荐机制、资源调配又是如何运行的？这条“快速通道”究竟是谁搭建的？我们更应该深思，为什么人们一尝到这个“甜头”，染上了这个“艾滋病”，就能立刻沦陷，抛下过去的“初心”？

我们该愤怒，但愤怒不该停留在“道德谴责”上；我们该行动，但行动不能止步于“个案处理”。

我们该用手术刀切除这个“病灶”，可更要查清它的源头是哪个权力系统在“造毒、输毒、扩毒”。

有人说，曝光与惩罚已经是正义在进步了。可我们更应该警惕，正义是否也在成为某些人博弈的工具和谈判的武器。这个“艾滋病”会不会是下一代的宿命？要治它，靠的不只是舆论激愤，而是制度的深度免疫。那么我们要从哪一环下手，才可能真正遏制这种“制度性病原体”？

让我们看看过去的先烈是怎么做的吧：58年前，中国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红卫兵们敢于站出来，提出“彻底砸烂中国医大八年制”的口号，揭露了这个所谓的“培养”制度是如何利用培养“天才”的等级制度，束缚着学生成为新社会的资产阶级。他们喊出了震聋发聩的口号：“我们不是培养贵族医生，而是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中，

“协和八年制”这个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脱离社会需要的贵族教育路线被红卫兵彻底打倒，而真正的人民医学生则走上了下乡、进工厂、到农村，而不是蜷缩在象牙塔中追求个人头衔和权力通道的无产阶级化道路。这不是对“精英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培养什么人、为谁服务、如何培养人的根本追问。

今天，“协和4+4”模式的争议，并不是因为它借鉴了国外的教育路径，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是自己阶级为自己开的见不得人的后门。我们要问：一个普通工人子女是否也能无障碍地走进这条通道？它是不是对所有背景的青年平等开放？在我们一再重复“培养拔尖人才”的时候，我们是否忘了我们的教育到底为哪个阶级服务？

同样，在北理工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也不只是一起“师德败坏”的个案，而是一种扭曲的制度关系：导师在象牙塔里做着“鲁迅与许广平”的美梦，把自己想象成灵魂的塑造者、人生的引路人；而学生则在“卧薪尝胆”的忍耐与筹划中，把与导师的关系视为一场资源争夺战、命运豪赌局——试图从那只紧握着保研名额、项目资金与学术话语权的手中，掰下一块属于自己的上升跳板。这哪里是什么“教育”，分明是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易场。导师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而是一位手握学术资源的“地方诸侯”，既裁定生杀予夺，也暗通权色之道；而学生，也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习者，而是一位心怀投名状的“机会掮客”，在明枪暗箭中精算着自己的前程与筹码。

得了艾滋病的身體，是靠不住免疫系统自我恢复的。它不是一次感染、一次疏忽，而是整个机体从骨髓到神经，从血液到器官，彻底失去了辨别敌我的能力。病原体不再是外来的，而是制度内部孵化出的毒瘤。这时候，指望“自愈”、幻想“改革”已经晚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让病毒转移、扩散、变异。对这样的病灶，唯有革命，唯有彻底清洗，才能救得了这个已经败坏的身体！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治愈这场制度艾滋病的唯一良药。不是哪一位“院长”下台就完了，不是哪一项“通报”出台就结束了，而是要让一切特权的制度病灶彻底暴露、彻底瓦解、彻底扫除！

这不只是一次高校风波，也不只是一起医疗丑闻，它是一次对权力深层结构的X光照射，也是一次唤醒群众觉悟的抗体注射。

彻底革命，才能彻底治病。

艾滋病虽不可治，但制度性的“艾滋病”，必须治，也唯有革命能治。

小米碰撞事件，资本的虚假营销

近日，一名年轻女性以及其两位同样去考公的女性朋友在夜间高速上驾驶小米su7，因操作失误不慎发生事故，以每小时97千米的高速撞上路障，电池漏液起火，车毁人亡。具救援人员回忆，前排的两位女性在他们到达时就已经伤重不治，后排的一名女性由于过度烧伤，抢救无效死亡。

据公开资料显示，车主的手直至出事故前几秒才接触上方向盘，且由于车门锁死，失去了逃生的机会，这才导致这三名女性被活活烧死

资本营销：小资产阶级幻想与血色包装

小米SU7的这起惨烈车祸，不仅是一次交通事故，更是一次资本对人命的践踏，是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又一次写照。小米作为“民族企业”的代表，凭借其“平民科技”的话语包装，动员了无数年轻人以为他们在购买“梦想”与“尊严”。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买到的，不过是冷冰冰的算法控制、工业流水线上批量复制出来的高风险机器。

电动车产业，尤其是智能化电动车，被资本主义媒体狂热吹捧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象征。但在本质上，它不过是资本通过“技术神话”再次驯服劳动者、收割消费力、掠夺剩余价值的一次攻势。小米SU7的热卖不是基于安全和性能，而是基于大肆炒作、直播带货、抽奖诱惑等方式对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理的精准打击。这类营销不是基于实证科学与道义责任，而是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暴利与收割。

一个根本问题必须被提出：为何年轻女性夜晚驾驶一辆新车，在未充分掌握性能的情况下，仍能被舆论与广告诱导去“冒险试驾”？这是对“梦想”的追求吗？不，是小资产阶级被商品意识形态“自由、速度、未来”所蛊惑的结果，是消费主义催眠之下的集体梦游。

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技术不是为了解放人，而是用来支配人、控制人，并最终剥夺人的生存空间。技术进步本应服务人民，但却在资本主导下走向了反人类的方向。这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警示的：技术的发展脱离了人的掌控，沦为剥削与统治的工具。



官商勾结：资本与权力的铁三角

在事故发生后，小米迅速启动“公关模式”：通过自媒体降温、组织专家“背书”、以技术参数为盾，逃避责任。这一切显示出资本早已准备好了话术体系，来对抗人民群众的质疑。更让人震惊的是，国家监管部门的迟缓与模糊态度，甚至连是否启动第三方独立调查都语焉不详——这难道不是资本与权力之间的“默契”？

所谓“安全测试合格”、“自动驾驶进入成熟阶段”的官方说辞，不过是用来为资本背书的官僚语言。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背后汇聚了政策倾斜、财政补贴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全套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小米的汽车项目自然享有某种“政策护身符”——在安全事故面前，依然能以“技术争议”来拖延乃至回避责任。

这正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官员追求政绩，资本寻求利润，媒体负责洗地，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安全被抛之脑后。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群众路线与“官僚主义是危险的敌人”。而今天，当“高科技”企业成为新的“权贵资本主义”代表，昔日的“政治挂帅”早已被“利益优先”所取代。

而这起事故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智能驾驶尚未成熟之际就大规模商业化，是将无辜群众当作“实验鼠”。这种行为与过去帝国主义用殖民地人民试验新药、新武器并无本质区别——资本在无产阶级身上做实验，而舆论却歌颂其“科技进步”，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结语：唯有革命才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面对技术异化与资本屠戮，唯有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武装群众，才能揭开“智能神话”的真相。毛主席曾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打碎旧世界。”今天，我们也必须打碎资本神话，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技术路线与社会制度。唯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唯有人民掌握技术与话语权，才能让科技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吞噬人民的生命。

让我们高呼：

人民的生命高于利润，人民的安全胜于技术！

打倒技术拜物教！打倒资本洗脑术！还人民以尊严，还真相以光明！



论马克思主义其二-科学社会主义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第二篇，剩余一篇将于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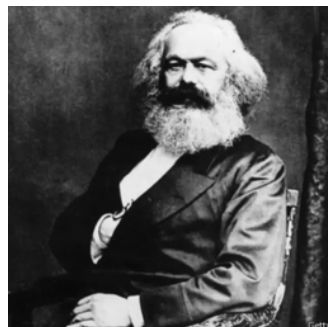
简介：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晶，其基本组成部分包括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其中，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原则，是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之上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实践路线图。在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从一门学说变成一门科学，就必须加以研究。”这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命名由来。什么是科学呢？科学并不像波普尔先生所写的那样，可以证伪，而是客观的真理，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生产的产物。这样昭示着它相较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它不是理想主义的主观构想，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继承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至此，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因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因为自己内部的矛盾运动走向消亡。本文将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源、本质、历史实践、理论发展和现实意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力图阐明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战略意义。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1）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试图提出社会的蓝图，但他们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把社会进步寄托于“理性”、“爱心”或者“善良资产者”的良知。他们要求改善，也只是要求劝说，没有实际的行动。这种脱离阶级分析、缺乏物质基础的理论，只能是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法国的政治思想、英国的经济学、德国的哲学成果，第一次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者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2）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阶级斗争理论：历史是一切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主义必然是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产物。剩余价值理论的政治结论：资本积累是剥削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建立是无产阶级为了摆脱剥削制度的历史选择。国家观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它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写道：

“它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自我灭亡，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挖了坟墓。资本主义总是要一个产业后备军，这是一个过剩的人口，这群人口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直接导致了生产的过剩，这一部分人口生活没有保障。还有一条就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联系），资本的有机构成必然会下降，这意味着资本能吸收更少的剩余劳动。这意味着资本无法按照正常的强度来剥削工人，这就是一个生产过剩。在这里，资本的生产过剩代表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匹配，所以，剥夺者要被剥夺了。在这里，光改一个分配形式是不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的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要斩草除根，改掉生产方式，不仅仅是改变这个分配形式。

(3) 阶级斗争的方法论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确立了一整套分析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群众自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一点不得不灌输进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有一个拥有军事化纪律的新式无产阶级政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首次获得的伟大胜利。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结合，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有化、计划经济等重大理论，极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列宁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战胜资本家的拼死抵抗，我们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就不能走向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4) 军事化共产党

需要一个军事化的共产党，是由以下几个根本原因决定的：

1. 阶级斗争的激烈性要求党具备战斗能力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必然走向暴力革命。资产阶级绝不会和平交出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统治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具备领导战争、组织武装斗争的能力，党本身必须军事化，成为革命战争的指挥中心。

2.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专政本质决定革命党必须军事化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国家是一个镇压阶级的工具。既然资产阶级依靠警察、军队、监狱维持统治，那么推翻这种统治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对抗的红色武装和军事化组织，否则革命只是空想。

3. 反修防奸的需要：防止党蜕变、被敌人瓦解

军事化不仅是为了对外斗争，更是为了对内保持铁的纪律。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党内必须有“战斗堡垒”一样的组织形态，



否则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就会腐蚀党。军事化是保持党的阶级性、革命性的重要保障。

4. 群众战争的需要：党是人民战争的指挥中心

毛主席指出：“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军事化共产党不是搞军阀主义，而是为发动、组织、领导人民战争服务的。党要成为指挥人民群众武装斗争的中枢，必须具备军事化的组织、训练、指挥系统。

5. 在新时代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世界各国帝国主义仍在干涉、掠夺、镇压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没有军事化的革命党，就不可能有效组织反抗，拉美、菲律宾、印度等地的革命经验都表明：军事化共产党是发动农村游击战争、最终夺取政权的核心力量。

结语：

没有军事化的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真正的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建设党、在军事化中保持党的纯洁性。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高度军事化的今天，无产阶级的党也必须军事化，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昭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的必然性。我们新时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拿好这杆枪，为群众做好表率作用。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绝不是要做尾巴，不是来反映群众的一般希望，而是应当率领群众，走向社会主义！

关于真理报：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longlivemaoism.wordpress.com/>

我们的纸飞机频道：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者可通过官网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或者订阅我们的杂志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论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列宁主义的核心原则

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包含了一系列确保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三大原则是：先锋队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这些原则在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中经过了严峻考验，证明了其正确性和必要性。

先锋队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核心

列宁主义强调建立一支由先进工人和职业革命者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战斗核心。列宁指出，只有在有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革命意识的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克服自发斗争的局限，进行有组织的革命。这一布尔什维克先锋队政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领导工人和盟军贫苦农民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现了历史性的胜利。

先锋队政党不同于松散的“大众党”或机会主义政党。列宁主义主张对机会主义者和动摇分子毫不留情地斗争，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这意味着先锋党必须有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允许各色改良主义派别混杂其中。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早期斗争中，列宁坚决反对孟什维克那种宽松的组织观，主张建立由坚定革命者组成的党。历史证明，没有这样一个先锋党，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了先锋队原则，才得以在风暴般的革命年代中始终走在群众最前列，成为革命的指路明灯。

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也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柱。列宁主义认为，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于“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用革命手段粉碎压迫者的反抗”——这意味着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民主，并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个新型政权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如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实行计划经济）保障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同时以革命暴力镇压地主、资本家和白卫反革命叛乱。历史经验表明，正是由于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才能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中保卫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无产阶级专政极大地扩大了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把过去只能由富人享有的民主变成了穷人和工人的民主，而对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则毫不手软地予以镇压。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

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与党内团结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组织原则。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实现集中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列宁主义认为，没有集中领导和统一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就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去系统地开展工作和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在党内讨论时可以各抒己见，但一旦形成决议，每个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保证了全党步调一致。

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才能在极端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保持团结和战斗力。即使在革命胜利后，列宁依然强调党内必须防止无原则的派别活动。1921年，面对党内出现的派别倾向，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禁止党内派别，以维护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这一措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反观托洛茨基等人在党内组织派别、小集团活动，正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斯大林尖锐地指出，党的集中领导原则经常遭到一些动摇分子的攻击，被污蔑为“官僚主义”或“形式主义”，然而没有这些原则，党的工作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指挥就是不可能的。列宁把反对民主集中制的人称为“俄国式的虚无主义”和“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倾向“理应被嘲笑和扫地出门”。可见，民主集中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它保证了在革命风浪中党如同一块钢铁般坚定，任何离心倾向都将被严厉批判和清除。

总之，先锋队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三位一体，构成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原则。在列宁的领导下，这些原则指导了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成功实践，展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革命威力。

托洛茨基主义主要观点及其批判

与列宁主义格外注重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实际群众力量不同，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种在俄国革命历史中特殊的思想体系，始终在关键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同列宁主义对立。尤其是在不断革命论、对工人国家的态度以及实际政治中的作用等方面，托派的主要观点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下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要害观点进行批判，并揭露其错误根源。

不断革命论的谬误：忽视革命阶段和同盟军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核心的理论主张之一。托洛茨基鼓吹所谓“不断（不间断）革命”，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经过任何“阶段”就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将革命不断推向国际范围。表面上看，这一理论似乎“极左”革命性十足，但实际上却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冒险主义。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托洛茨基版的

“不断革命”实质上是不把农民视为革命力量的理论：托洛茨基的革命路线试图“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这意味着托派否认当时俄国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革命性，否认工人阶级能够联合农民一起完成民主革命阶段，而妄想由无产阶级单独“一步到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的理论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就已显示其错误。托洛茨基当时幻想无产阶级凭一己之力夺权，而轻蔑农民是“落后势力”。列宁主义则与此针锋相对：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广大农民首先推翻沙皇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策略在1917年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并依靠农民（特别是贫农和士兵）一道进行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不可能牢固掌握政权。托洛茨基却主张跳过这一阶段，结果只会是让工人阶级失去自己的同盟军农民，最终导致革命失败。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起列宁主义就一直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捍卫工农联盟和革命阶段论。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包含着对世界革命的教条主义理解。诚然，马克思主义者都追求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主义主张应根据各国具体历史条件分阶段推进革命。托派则狂热地鼓吹各国同时“永久”革命，否认落后国家可以有相对独立的革命进程。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断言“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的革命，苏联革命注定要失败”，公然反对列宁生前设想的苏维埃政权巩固路线。当时斯大林等人提出“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对托洛茨基这一悲观论调的有力回答。历史事实证明：苏联在一个国家内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没有等待西方无产阶级的“救援”，同样屹立不倒。这无疑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沉重打击：托派低估了落后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潜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巩固能力，其“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预言被苏联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实例所粉碎。

归根结底，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否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性的基本原理。这种形“左”实右的理论看似革命，实则会使革命者脱离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我们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逐步推进革命进程；而托洛茨基的教条主义恰恰违背了这一点，把革命当作可以跳跃时空连续进行的直线过程。这种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冒险主义和主观主义。正如列宁痛斥托洛茨基1917年提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那样：这是试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是对革命策略的儿戏。列宁主义坚持脚踏实地依靠工农大众分阶段地夺取胜利，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则是脱离群众的空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证明行不通。



托派对工人国家的态度及其破坏作用

托洛茨基主义在对待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上，采取了极其有害的立场。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被背叛的革命》等著作，极力鼓吹苏联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主义堕落的工人国家”。他承认苏联仍保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成果，却声称苏维埃国家政权已被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窃取，从而背离了工人民主。他公然号召要对苏联现政权进行一场新的“政治革命”，以推翻所谓官僚集团的统治。这种论调实际上是否定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建设的伟大成果，等于把社会主义苏联的党和政府视同敌人来对待。

托洛茨基自称此举是为了“纯粹”的工人民主，然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主张只会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给反革命势力以可乘之机。1930年代是帝国主义对苏联虎视眈眈、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危险时期，却也是苏联全力推进工业化、巩固国防的关键时期。在此关头，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不但不支持苏维埃政权，反而不断从内部进行诋毁和破坏，被开除出党后仍在国际上散布攻击苏联的言论。苏联政府指控托派分子从事颠覆和间谍活动并非空穴来风——在莫斯科审判中揭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等阴谋

（尽管有夸大成分）至少反映出托派活动已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现实威胁。斯大林警告说，新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最危险之处在于：它完全可能成为非无产阶级分子集结起来以削弱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中心。也就是说，各种仇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会把托派思想当作突破口，团结在其周围共同反对工人国家。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托派立场的客观破坏性。在二战前夕和期间，正当全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法西斯入侵者决死搏斗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却鼓吹苏联政权“与法西斯无异”，鼓动所谓第三阵线斗争。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否定了保卫苏维埃祖国的正义战争，客观上充当了纳粹和反共势力的帮凶。再看世界范围，凡是真正由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古巴等），托派无一不持敌视态度，指责这些国家“背叛革命”需要重新来过。这导致托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经常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颠覆宣传遥相呼应。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人民中建立起巩固政权，托派却散布“中国革命被斯大林主义歪曲”的谬论，妄图挑拨群众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这一系列事实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自己建立的国家缺乏起码的阶级感情和立场：他们看不到苏维埃或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蕴含的真实工人利益，而是一味苛求所谓“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最终走向反革命的立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调在现存工人国家内部通过斗争完善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截然不同，托派鼓吹的是推翻和瓦解现政权。这样的主张只会把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反动派。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缺点和错误，应通过党内斗争和群众路线加以克服，而绝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托洛茨基主义对此完全不理解。列宁早就预见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敌人不会甘心失败，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和官僚主义倾向也会滋生，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解决的办法不是发动另一次革命去打倒自己的政权，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自我革命。托派跳过了这个前提，直接鼓吹“新的革命”，其效果无疑是配合资本主义复辟势力。难怪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品质极为警惕，他曾尖锐地将托洛茨基比作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鄙称其为“厚颜无耻的犹太什克-托洛茨基”。这种狠辣的评价正是因为托派立场之可疑和危险：对内破坏党的团结，对外丑化苏维埃政权，其行为与反革命无异。总而言之，托洛茨基主义对待工人国家的态度是极不负责和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无产阶级长远利益，也在实践中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脱离群众与教条主义的国际革命战略

托洛茨基主义在实际政治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脱离群众、沉湎于教条化的“国际革命”口号，从而对工人运动起到分裂和破坏作用。这在历史上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托派因其理论和活动方式，始终未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反而倾向于自我边缘化。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往往自诩为“正统”的革命理论家，但他们忽视了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现实需求和觉悟程度。在俄国革命时期，托洛茨基一度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例如红军组织者），但在党内却屡屡因为脱离实际而失去支持。1921年克朗施塔得水兵叛乱时，托派分子表现出对叛乱的不切实际同情；1923年德国十月起义失败后，托洛茨基又对共产国际策略横加指责，却提不出可行的方案。这些都使普通党员和群众对托派路线失去信任。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路线虽要求严格纪律和艰苦斗争，却能切合当时群众的心理和利益（如“土地、面包、和平”的口号就是列宁抓住农民和士兵迫切需要的体现）。托派的激进空谈无法同这种扎根群众的工作相比。

其次，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上奉行小圈子和派别活动，客观上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团结。列宁主义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高度统一，不允许派系林立，因为那会分裂工人阶级力量。而托洛茨基却屡次组织反对派小集团，试图和各种机会主义者联合向党的路线施压。例如**1912年的“八月联盟”**就是托洛茨基拼凑孟什维克、取消派等反列宁主义者组成的联盟，打着“统一”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当时无情揭露了托洛茨基这种两面派行径，指出托洛茨基“一贯在各派之间飞来飞去”，时而充当极端的孟什维克，时而假扮“左派”革命论者，今天和经济派合作，明天又同取消派结盟。托洛茨基自命超然派别之上，实际上比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更为阴险，其行为被列宁斥为“以高喊统一之名行破坏统一之实”。这种派别活动削弱了党的凝聚力，也欺骗和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使他们误以为托派代表更“民主”的路线。然而历史证明，托派的所谓“更革命”不过是空喊口号，他们自己内部也充满派系纷争，根本无法形成对现实斗争有领导力的组织。最终，托派的小团体不是被工人所抛弃，就是沦为资产阶级警察清洗的对象（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在30年代清除托派影响，就是因为他们危害团结）。

再次，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革命战略教条化，脱离各国具体国情，因而往往走向失败甚至破坏现有斗争。托派强调世界革命的“一体化”进程，鼓吹所有国家立即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任何性质的阶段划分或战略妥协。在实际中，这种策略导致他们看不到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阵线斗争中蕴含的革命契机。举例来说，托派曾指责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是“尾随资产阶级”，

鼓吹中共应立即争夺政权。虽然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证明了联合策略的问题，但托派的简单否定同样有失辩证法。他们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中国革命必须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客观规律，只是一味叫嚷“无产阶级直接夺权”，结果在中国完全孤立于革命群众。事实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国共失败教训后，更加灵活地运用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成功发动农民战争并建立革命根据地，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中国托派小圈子却在城市冒进起义接连碰壁，甚至一度与日占时期汪精卫伪政权暗通款曲，被群众唾弃，最终彻底失败（中国托派头目陈独秀等人的可耻下场就是明证）。这说明托派照搬“不断革命”教条，不顾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必然脱离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因而不可能成功。

在西班牙内战等其他历史场合，托派也重复了类似错误：他们一方面痛斥人民阵线的局限，另一方面又缺乏现实力量，只能纸上谈兵，客观上削弱了工人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总的来看，托洛茨基主义者热衷于清谈全球革命，却轻视脚下的革命实践；他们眼中只有抽象的“世界革命”蓝图，却没有真正融入本国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实际斗争。因此，托派往往变成一小撮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宗派，其活动对革命运动有扰乱而无建设。毛泽东曾经告诫，中国革命要防止“本本主义”，要从实际出发。托派正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典型：奉几本托洛茨基的著作为圣经，而无视变化的客观现实和群众意愿。这样的路线在实践中注定碰壁，不是导致革命机会的丧失，就是引发不必要的内部分裂和损失。

理论根源：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透过以上对托洛茨基主义各方面的批判，可以发现其错误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根源，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和阶段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托洛茨基主义的种种主张（无论是不断革命、一国革命不可能论，还是鼓吹“纯粹”的工人民主、不容许任何阶段性妥协）都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色彩。他们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构建理论，而不是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历史条件出发。托派看不到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力量在革命中的辩证作用，一刀切地将其排除出革命阵营；托派急于求成地希望一步跨入世界革命高潮，却忽视了帝国主义体系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否认落后国家革命可能先胜利、先进国家革命会暂时迟到的客观现实。这些错误都源于对不平衡的矛盾运动缺乏辩证理解，而用绝对化的教条代替了对实际情况的分析。

此外，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上，托派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们把苏联存在的问题放大为整个制度“堕落”的绝对判断，看不到苏联社会中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人民内部改进的可能。他们把“官僚集团”视为铁板一块、与工人阶级绝对对立，因而主张用对抗性手段颠覆整个上层建筑。

这种看法割裂了苏联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静止地把苏联社会分成两个阵营，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政党内斗和自我净化的辩证过程。结果，托派的方案不是走向革命的更高阶段，而是走向反革命的深渊。相形之下，列宁主义始终坚持辩证法，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列宁曾多次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策略，例如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先争取民主和平再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利用市场换取经济恢复等等。这些方针都体现了辩证思维：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变通，不僵化不冒进。因此列宁主义能够不断克服困难，赢得群众支持。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抱残守缺，不懂得权变，最终被历史淘汰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坚持列宁主义的必要性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功，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则在历史检验中遭到惨痛失败。俄国十月革命和随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说明：只有坚持列宁主义，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并团结广大劳动群众，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并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偏离列宁主义、采取托派那种脱离群众的冒险路线，必然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甚至灾难。

在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等人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运用先锋队理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成功地捍卫了革命成果，将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帝国转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一过程中每当遇到党内路线斗争，列宁主义者战胜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论是“左”倾的托派还是右倾的布哈林派），保证了革命航向不偏离。反观托洛茨基，自1905年以来多次提出与列宁相悖的策略，无一不是错误的。例如他否认农民革命性，结果1905年革命失败流产；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派别决裂建党，结果事实证明列宁建党的正确；他鼓吹不断革命，结果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并未“自动崩溃”；他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结果苏联壮大到足以击败法西斯德国。历史已经对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作出了公正的裁决。正如斯大林所总结的那样：要么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要么是革命的列宁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证明是一条死路。



这些历史经验对当前的无产阶级斗争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依然严重，各国工人阶级依旧肩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在新的斗争征程中，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列宁主义的指导，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首先，需要重建和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在很多国家，工人运动曾被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削弱甚至出卖，革命政党蜕化或分裂。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以列宁主义原则整顿队伍，把坚定的革命者组织起来，重新赢得群众信任。没有一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武装起来的先锋党，就不可能有未来的革命胜利。其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资产阶级绝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革命斗争获得，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予以巩固。这一点在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中也可反证：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所谓“全民国家”或多党“民主化”），就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了大门。再次，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具体分析的工作作风。列宁主义教导我们，革命纲领和策略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任何脱离群众、空喊口号的做法都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害。在当代，托洛茨基主义式的宗派仍有少量存在，他们标榜激进，但拒绝与工人阶级的大组织和真实运动相结合，结果只能在边缘徘徊。这提醒我们，务必警惕类似托派的思潮对青年和运动的侵蚀，在思想上筑起防线。我们要教育干部和群众认清托派理论的错误本质，防止其以“革命”言辞迷惑人心。实践证明，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并灵活运用革命策略，才能不断壮大无产阶级力量，推进社会革命走向成功。在革命的理论战线上，我们也应当保持高度的战斗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乃至“左”右倾空谈家斗争的历史。列宁主义是在与考茨基主义、孟什维克式机会主义斗争中诞生的，同样也在与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极左”实右思潮的反复交锋中得到了锤炼和丰富。时至今日，打着“托派”旗号否定列宁主义的人仍然存在，有的鼓吹所谓“直接民主”反对党的领导，有的鼓吹“全球大革命”来否定任何具体斗争步骤。

本质上，这些都是旧托洛茨基主义迷雾的翻版。我们必须用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火力予以回击。在思想上肃清托派谬论的影响，就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对列宁主义核心原则的重温和对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深刻揭露，我们可以使广大革命干部和先进分子进一步认清什么道路能够带来胜利，什么歧途只会导致失败。

总而言之，列宁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托洛茨基主义则早已被历史判定为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谬误思潮，只剩下供后人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价值。我们要以高度的战斗精神和理论自觉，坚持和捍卫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坚决批判一切托派性质的错误观点。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指导当前和未来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本要求。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才能在新的斗争中少走弯路，汇聚更广大的群众力量，向着最终的解放胜利奋勇前进！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为与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和平谈判制定条件

马列毛主义运动研究

2025 年 4 月 2 日，博拉德里·科塔古德区 (Bhadradi Kothagudem District.): 据称，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表示，如果中央和邦政府停止正在进行的“卡加尔行动”(毛主义政党称其为种族灭绝行为)，即在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贾坎德邦、中央邦和泰伦加纳邦的持续行动，并停止安全部队设立新营地(作为“军事进攻”的一部分)，那么该党愿意与中央和邦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今天据称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名义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其发言人阿巴伊(Abhay)同志表示：“我们欢迎‘和平谈判委员会’于 3 月 24 日在海得拉巴组织的圆桌会议，会议主题为——联邦政府和‘毛派’应当宣布无条件停火并举行和平谈判，在当前形势下。”

阿巴伊同志在声明中说：“我们始终本着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准备进行和平谈判。因此，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这些建议，以营造有利于和平谈判的氛围。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回应这些建议，我们将立即宣布停火。”

阿巴伊同志在声明中进一步宣称：“由印度教至上主义法贾克党领导的中央政权以‘卡加尔行动’之名对本国人民发动军事进攻，破坏了部落人民的生活和基本宪法条款。这种残暴的进攻旨在镇压阿迪瓦西人争取水、水力、土地权利的革命运动，促进企业利益以允许掠夺自然资源，最终瓦解国家的联邦制度并建立一个独裁的单一制国家。”

“过去 15 个月里，在邦级层面(主要是恰蒂斯加尔邦)由政府发动的残酷攻势中，包括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和干部、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的指挥官和成员以及普通阿达西族民众在内的 400 多人丧生。在‘卡加尔行动’中丧生的人数中，阿达西族占三分之一(1/3)。”阿贝哈同志在声明中如是指控道。

阿比哈同志在声明中呼吁：“我们恳请包括民权组织、阿迪瓦西人组织、达利特人组织以及青年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还有和平谈判委员会，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向中央和各邦政府施压，要求其依据我们提出的建议进行和平谈判。”

来源：“红色火花”网站

<https://www.redspark.nu/en/peoples-war/india/cpi-maoist-cc-sets-terms-for-peace-talks-with-central-and-state-governments/>



《人民报》：国际团体向新人民军致贺信庆祝其成立56周年

马列毛主义运动研究

译者按：《人民报》（Ang Bayan）是菲律宾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3月29日，国际社会各党派和组织向新人民军表示祝贺，庆祝新人民军成立56周年。这些团体认识到新人民军在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为打破对菲律宾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枷锁而进行的伟大的武装斗争。

斗争中的菲律宾人民之友(the filipino people in struggle, FFPS)、爱尔兰反帝国主义行动菲律宾之友委员会(AIAA)、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 (Marxist-Leninist), CPA(M-L))等组织向我们表示了问候。

据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称：“菲律宾人民军 56 年来始终站在反抗菲律宾法西斯政权和腐败官僚以及帝国主义的最前沿。”来自澳大利亚的他们对人民军及其斗争表示全力支持，祝愿他们的同志取得成功并长盛不衰。

爱尔兰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组织称，人民军队的斗争“是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最先进的一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一”。正因如此，他们指出，人民军队在反帝斗争中发挥着灯塔的作用。

该组织进一步补充道，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主义者必须努力重建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与菲律宾之间的国际联系。“我们期待着（菲律宾新人民军）未来的胜利，并祝愿他们在庆祝活动中一切顺利，努力取得成功。”该组织表示。

斗争中的菲律宾人民之友赞扬了新人民军为推进自 2023 年 12 月以来菲共所倡导的整风运动所做出的努力。斗争中的菲律宾人民之友表示：“作为新人民军、革命运动和菲律宾人民的红色战士和指挥官，我们正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推进，让我们也积极投身于支持菲律宾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

来源: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ang-bayan/international-groups-send-greetings-on-the-56th-anniversary-of-the-npa/>

时间: 2025年4月5日



土耳其：“让我们重新点燃燃烧的草原，加强并发展反法西斯斗争！”

马列毛主义运动研究

尽管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民族行动党（MHP）联盟一方面向库尔德人伸出和平之手，但另一方面却对库尔德人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群体挥舞着警棍。一边唱着“民主化”的摇篮曲，另一边却连体制内的权力平衡都无法建立。在法西斯主义百年的历史中，各民族、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群体、被压迫的宗教都遭到了无情且血腥的迫害，法西斯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呈现出无比残酷、无情和毁灭性的形式。这种情况是持久且稳定的。这也与所有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本质相契合。当某个法西斯集团掌控国家政权时，专制是其唯一所知的手段，而一旦失去政权，它又会成为“民主和人民利益”最坚决的捍卫者。这已成为其不可更改的法则。土耳其的历史就是明证。

随着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联盟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了200年，它他现在正在强化自身的两大主要特征。其一是法西斯主义特质，其二是经济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这并非出于偏好，而是其社会经济体系的必然。它将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视为帝国主义战争狂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就会出现诸如无法保护通过恐吓、暴力、欺诈和屠杀手段建立起来的边界等关乎存亡的发展。这就是他与库尔德人采取和平举措的原因。这也是他竭力在国内尽可能强化法西斯政权的原因。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德夫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发起的进程不会包含国家的“民主化”，这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一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民族行动党联盟持续对民众、库尔德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进行压迫和暴力镇压，剥夺他们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它打压、镇压并解散竞争派系。如此一来，它撕毁了宪法、法律和法令。不再有任何策划袭击的规则。毫无一致性可言。任何妨碍其行动的因素都会成为攻击目标。所谓的“投票箱里的东西就归投票箱所有”只适用于他们。所谓的“人民意愿”只有在结果对他们有利时才适用。宪法和法律只要能保护他们就是神圣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意见自由只有在得到赞扬和支持时才有效。盗窃、偏袒、裙带关系甚至剥削都必须都是他们的专长。武器的所有权垄断权不容商榷，只有他们才有组织的权利。

对于其他人来说，一切都是被禁止的：恐怖主义、颠覆活动。这就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崭露头角的正在遭受破坏的伟大的土耳其。

这种做法导致人民大众陷于毁灭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贫穷之中。它还要求清算和恐吓所有有组织的人民力量。不仅如此，它还导致警察和司法机构中所有其他反动集团的垮台、削弱和威胁。

这是警方和司法部门长期以来对埃克雷姆·艾米奥格鲁(Ekrem Imamoglu)施加压力的目的所在。埃克雷姆·艾米奥格鲁将广大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联盟的不满、愤怒和反抗转化为增加其政治权力的有利素材，而他正是此次攻击的核心目标。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手段残忍至极，他们利用一切法西斯形式来巩固自身权力并摧毁对手。他们残忍到足以让埃克雷姆·艾米奥格鲁35年前获得的大学学位成为法庭裁决的对象。这种无视规则、法律和宪法的派系斗争的意志首先体现在取消了他35年前获得的学位上，随后又通过大规模的“腐败与与库尔德人结盟参与选举”的逮捕行动得以彰显。

诸如“投票箱”、“选举”、“话语权力”、“政治民主空间的拓展”、“国家意志”之类的虚伪言论遭到反向抨击。民众对这些攻击的愤怒被共和人民党视为对“国家存续构成的潜在威胁”。出于这种担忧，共和人民党只向民众发出这样的劝告：“不要上街抗议，我们会进行抵抗”，而正在竞选总统的埃克雷姆·伊马莫卢于3月18日和19日因公然无视竞选任职的条件而被捕。

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攻击，共和人民党（CHP）的领导和官员们附和着政府的胡言乱语，并呼吁大家在3月23日参加初选。民众对政府的这种胡言乱语并不买账，他们对正义与发展党（AKP）和民族行动党（MHP）的勾结感到愤怒。在过去十年里，很明显，正义与发展党-民族行动党联盟集团过于依赖民众无法做出反应这一点，不管他们如何攻击他们，如何肆无忌惮地对待他们，如何让他们遭受如此大的痛苦、贫困和折磨，以及依赖像共和人民党这样的作为国家存续守护神的角色的警察式的组织的存在。

但结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那种愤怒的火花以及对致命一刀的反应会转化为行动这一规则奏效了。当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斗达到最为激烈和残酷的程度时，那火花就被点燃了。

民众并未对表现得像宫廷小丑般的共和人民党（CHP）嗤之以鼻，而是主动采取行动。他们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怒火。数十个省和地区的街道以及广场，尤其是数十所大学里，都弥漫着对法西斯性质的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联盟的愤怒情绪。在萨拉查内和大学校园里，为阻止抗议活动而设置的警察路障被摧毁了。民众团结一致，愤怒地反抗政治压迫和暴政，反抗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反抗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刻都在掠夺他们的成果的行为，反抗在他们为解决重大问题而苦苦挣扎时，他们眼中的奢华和浮华的引入。第二天，由于害怕和想要控制正在发展的运动，共和人民党被迫用诸如“街头行动”之类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民众出于打破他们所处环境中那些由当权者、在体制框架内由制度所决定的规则所施加的障碍所形成的藩篱的需要而行动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权者以最无情的方式阻碍着民众的行动。一方面，共和人民党呼吁举行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树立规则的壁垒以及国家的存续之盾。他们惶恐不安，害怕出现一种游离于体制之外、取代议会并以他们的名义采取抵抗行动的运动。



埃克雷姆·伊马莫卢(Ekrem Imamoglu)被捕一事引发了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和反应。这场运动本身倾向于走向独立，并通过采取积极姿态来对抗强加给它的束缚以进行自我保护。3月19日和20日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开来，愤怒的情绪已转化为实际行动。当我们揭开埃克雷姆·伊马莫卢的面纱时，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对体制的仇恨，是对它只给予人们奴隶般自由这一事实的仇恨。

更重要的是，尽管遭到攻击，它仍坚持走独立路线。在大学和萨拉查内聚集起来、高举标语口号的民众的意愿是反对像以前那样被统治。他们的意愿和决心是要前往那些被警方障碍物封锁的象征着斗争的地区。为期四天的示威活动禁令被民众打破了，他们在同一时间涌上街头和广场。然而，最重要的是，那种盛行的政治风格——即通过议会和选举来获取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民主成就——受到了质疑和拒绝。如今，导致这场运动并点燃导火索的“受害者”共和人民党，其态度导致了这场运动，并点燃了这场运动的火花，现在正试图占有这些民众正在为独立政治和斗争而努力争取的结果。

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强化其独立架构、明确其目标导向以及与之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民众渴望民主与自由。而那些坚信民主与自由的目标唯有通过和解与和平才能实现的库尔德人，在诺鲁孜节这天会前往田野劳作。必须清楚的是，土耳其政府绝不会通过和解、对话与和平来实现自身的民主化，它对此毫无兴趣。土耳其政府正竭尽全力将自己定位为该地区的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那些正准备发动战争的统治阶层，需要一个更具压制性、民族主义倾向和侵略性的内部架构。法西斯化的正义与发展党-民族行动党联盟集团也需要这样的架构。库尔德人的和平对于能够在该地区更好地开展斗争是必要的，而剥夺和破坏全体人民的自由则是为了加强“内部战线”。民众的组织混乱、分裂以及无法形成独立行动的能力，正是所有统治者最渴望看到的。他们最清楚当民众的潜在能量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时是多么伟大和光荣。

如今，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捍卫那些被剥夺的民主成果。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不仅正义与发展党-民族行动党联盟内部阶层如此，就连共和人民党也对此持敌对态度。革命力量必须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并强化其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这些大学已沦为毫无学术自由可言的场所。民主、科学和学术教育已被托拉斯集团和国家的反动势力摧毁殆尽。大学里潜伏着的活力已被激发出来。我们需要动员起来，打破那些阻碍学术、民主和科学教育的障碍，并且需要加大努力来培养和增强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生活在贫困、艰难和痛苦之中。工人阶级的诉求和反抗正受到警方和司法部门的压制。这场运动将给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勇气。我们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工会工作以及动员工人和劳动者为自身权利挺身而出的态度。权利诉求必须得到传播。

我们不要被法西斯派别鼓吹的民主与自由的说辞所蒙蔽。我们要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来实现人民民主，并加大斗争力度。民主不是通过选举和投票箱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人民的有组织斗争来达成的。

新罗孜节的诉求以及3月19日事件所引发的火花代表着民主诉求。人们所期望的是自由。实现民主平等、争取权利对抗剥夺最根本民主成果的斗争必须达成共识。需要更大的团结和更多的联合行动来取得更大的成果。土耳其、库尔德以及来自不同民族的劳工阶层如今正从长达十年的噩梦中觉醒。独立的政治革命斗争的基础正在变得更加坚实，条件也在逐渐成熟。被剥削的阶级、被剥夺了完全平等权利的库尔德人、在叙利亚遭到屠杀且被告知未来命运的阿拉维派教徒，以及所有渴望自由的阶级和阶层，都应该在2025年通过斗争为法西斯土耳其挖掘坟墓，团结起来为人民民主而努力，并挑战统治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当广大民众将街道作为独立的行动领域时，他们无疑会拓宽视野、发展能力、检验力量、提升意识并尝试改变意志。革命的必然趋势必须是将这种倾向转化为政治权力，进一步将其军事化，并将其导向实现政治权力的目标。

让我们为民主成果打造更强大的组织吧！
别被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手段所蒙蔽！
让我们把注意力、理解力、洞察力以及团结一致的精神，集中到那点燃火花的引火者身上，不如把它们集中到那将因火花而被点燃的干枯草原上！
让我们走上街头，让我们投身田野，怀着点燃这片干涸草原的雄心壮志！

党人
2025年3月21日

来源: 土耳其《党人》(Partizan)

<https://www.partizanmlm32.net/p-artizan-tutusan-bozkirin-yanginini-harlayalim-anti-fasist-mucadeleyi-guclendirip-gelistirelim.html>

<https://redherald.org/2025/03/26/p-artizan-lets-re-ignite-the-burning-steppe-strengthen-and-develop-the-antifascist-struggle/>

论波兰问题

德国
K·马克思

先生们！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柯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柯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柯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柯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末，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20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柯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们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什一税，不服劳役，也就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怪克拉柯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柯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245]。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导师语录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

（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列宁-国家与革命



Президен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друзей Лен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ОСКОВСКИЙ